

澳門與流散民族*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流散，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意思是分散，這一問題值得引起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其他學者的關注，以便研究歷史上或當前不同社群選擇移民的原因及影響。

美國人類學家及歷史學家James Clifford在其文章“流散”¹中提出是否後殖民時代流散的發生意義着遷移、遠離原住所建造房屋、以及排斥、取代或者邊緣化的經驗。作者不只指出關於流散總是陷入強大的世界歷史視野中的政治矛盾，而且現實中遷移的發生具有特殊性或只反映一時的情況。人類歷史一直都有移民潮的發生。澳門也不是例外。十九世紀在中國南部的那一小塊飛地上就出現了土生葡人的早期移民活動。

除了非洲以外，見證土生葡人流散的澳門之家以及與澳門有聯繫的文化中心的代表²遍佈其他大洲。

* 本文僅指澳門葡萄牙裔的流散。

** 歷史學學士、澳門歷史研究員、里斯本地理協會亞洲委員會副主席，曾撰寫過多本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

1. James Clifford: “流散”，載於*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劍橋麻薩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44-277頁。
2. 世界各地的澳門之家及澳門中心：歐洲 — 位於里斯本的澳門之家；位於里斯本的澳門之家基金會；澳門之家基金會澳門文獻中心。亞洲 — 最早的流散之家，位於香港的葡人俱樂部；位於九龍的葡人俱樂部。大洋洲 — 位於澳大利亞悉尼的澳門之家。美洲 — 巴西：里約熱內盧澳門之家；聖保羅澳門之家；加拿大：加拿大澳門之家（多倫多）；溫哥華澳門之家；西部加拿大澳門文化協會；澳門朋友俱樂部，這裡上演中國合唱和樂隊表演；美國：最早成立的美國土生葡人聯盟（UMA）；加州澳門之家；加州葡人俱樂部；作為3間機構的娛樂社交中心的澳門文化中心（加州費利蒙）；促進有關澳門的研討會及展覽的研究中心，澳門遺產及文化協會。該等機構通過總部設在澳門的土生國際聯誼會與澳門保持聯繫，並與其他機構，如澳門國際研究所，保持合作。

這樣從澳門向全球的流散因其來源地地理空間的狹小而使人格外印象深刻。在漫長的歷史中，澳門有過與其狹小領土不相襯的政治、外交及文明意義上的重要性。

自從十六世紀葡萄牙在這裡取得據點，鑲嵌在封閉的、自給自足的中華帝國南部的這一小塊半島一直是不同族群到達及出發的“港口”，因此形成對族群多樣性非常包容的特性。

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廣州，作為中國對世界唯一開放的港口，正因此在這一帝國內擁有戰略上的重要性，並且對葡萄牙人日常生活都有影響。正是在廣州這個大都市在中國官員事先規定的期限內與不同國家的外國人進行交易。過了該期限，商人們需要離開廣州並返回他們生活並經營公司³的澳門。

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中國的失利改變了這一狀況。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1）使英國人佔據了香港島，並導致於1842年簽署了《南京條約》，迫使天朝開放五處港口對外通商，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

中國與英法美俄聯軍在1856至1860年發生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天朝接受其他的條款：開放更多的通商港口，給予商人與天主教傳教士活動的自由以及在北京設立外國使館（《天津條約》）。

1842年見證了英國勢力的勝利，這造成了此地區歷史上結構性的轉折，澳門受到直接的影響，它不再是與中國建立聯繫的唯一地區，也導致了移民潮的開始。伴隨着相鄰地區英國勢力以及其他外國列強勢力的崛起，加上澳門這塊葡萄牙飛地面臨的經濟衰退，“為了擴展家族生意，或者因為所在的美國或英國的商業機構擴展生意的策略所需，或者因為經濟危機的促使”⁴，土生葡人開始在其他港口城市尋找出路。土生葡人的移民潮在空間上構成三角形的關係，即由葡萄牙管

3. 東方基金會會址，原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所在地，外國公司奢華建築的代表之一。傳說賈梅士曾在側面的花園裡寫下部份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現在仍在這裡緬懷這位史詩詩人。現為東方基金會會址。

4. 日諒教授（Alfredo Gomes Dias）：《土生葡人的流散，澳門、香港及上海（1850-952）》，第241頁。

理的澳門，軍事衝突形成的殖民地香港，以及由包括外國列強經濟集團控制的公共租界、法國領事管理的法租界、以及中國官員管轄的中國城組成的三股勢力控制的國際城市上海。⁵ 香港和上海很快變成東亞國際商業中心。

隨着英國人在香港島的佔據，澳門流散的第一個目的地即為此珠江三角洲另一端的英國殖民地。公司、職員及資金都向着這西方的新商埠轉移。由於香港商業活力形成的向心力，澳門及廣州的英國商業公司，部份海事從業人員及很多洋行選擇遷移。澳門1845至1862在位的馬他主教 (Jerónimo José da Mata) 稱，澳門遭受了相當的損失。主教在1846年提到“我們這裡處在悲傷的狀況，我們的財富僅依靠貿易，它正在不斷衰退，而英國佔領的香港卻在不斷的興盛。雪上加霜的是每天都發生的移民，甚至有全家移民的，包括很多澳門的年輕人，他們在本地沒有生存的機會，而在異地他鄉找到工作。”⁶

與中國貿易的百年歷史，對中國特質（尤其是官場）的了解，對廣東話及英語的掌握構成澳門葡裔在香港取得成功的決定因素。這一族群通過內部通婚，加強家族聯繫——“這裡有他們的爸爸、媽媽、姐妹和妻子”⁷——文化上從來沒有放棄葡裔身份認同，正如1880年舉辦的賈梅士逝世三百週年紀念活動⁸，這種活動正是為了對抗英國霸權的壓制而加強自身身份認同。

上海是澳門流散的第二個目的地。1840年代末第一批土生葡人被其有力的經濟增長所吸引而來到這個港口城市。⁹ 由於享有國際城市

5. 同上，第133頁。

6. 同上，第258頁。

7. 同上，第330頁。

8. 土生族群通過舉辦賈梅士逝世三百週年紀念活動提升了在外國人眼中的形象。當地媒體讚揚了這一慶典，John Pope爵士致信給三百週年活動委員會主席José Antonio dos Remedios先生，請求《慶典日誌》贈書一本，以便轉送給殖民地大臣金伯利伯爵，進而使英國政府瞭解到葡裔族群的貢獻。從事寫作的Gedeco Nye先生請求贈送四本《慶典日誌》以寄給其文人朋友。斯德哥爾摩人類學和地理學協會成員Frederico Degenner先生請求給該協會《慶典日誌》贈書一本。— P. A. da Costa：《為達爾文主義的辯護》，香港，1880年。

9. 1919至1927年間，由於外國租界內的活力、北京中央權力的衰落、共和中國的脆弱、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南部，所經歷的激烈的社會運動造成的分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外國列強的衰退，上海達到經濟高峰。參見日諒教授，第156頁。

的特殊地位，這個港口城市包括一個劃分給西方列強由領事管理的區域，這個區域不受北京政權的管控，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尤其是治外法權。上海的租界區位於黃浦江左岸，“那裡有集中了該城市商業活動的碼頭和海關”。¹⁰ 與家人一起生活在那裡的葡萄牙人很多是外國公司裡的職員及排版印刷員工。根據日諒教授的研究，當時葡萄牙對英國政治與經濟上的依賴關係反射到上海土生族群與英國人族群的社會地位的對比。社會地位的不同使土生族群遠離政治與城市統治決策中心，這與在香港的情況不同，在香港澳門很多土生移民在英國殖民地管理層起到很重要的參與作用。¹¹

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以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上海租界地的存在，這引發了大撤離，香港在1941年日本入侵的時候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澳門接收了大量的難民。

從那時起，土生葡人不再只是選擇中國臨近地區，其流散遍佈所有大洲。他們選擇在其他地方重新開始生活，在那裡形成土生葡人社團直到21世紀初的現在繼續保持其獨特身份及與來源地澳門的聯繫。美國、加拿大和巴西；葡萄牙和英國；非洲葡語國家和澳大利亞是他們主要選擇的移民地。¹²

10. 有關內容參見日諒教授（Alfredo Gomes Dias）：《土生葡人的流散，澳門、香港及上海（1850-1952）》，第143-146頁。第一任領事為英國人George Balfour，1843年被任命，領館設在向一位中國富商租用的大宅裡，他在香港也有資產。之後法國領事（Charles de Montigny）1847年被任命，1849年成立法租界。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城中城。1863年美國與英國協議設立統一的租界，即公共租界，而不包括法國。法租界是高尚居住區，遍佈咖啡館、精品店和餐廳的霞光路被認為是上海的香榭大道。澳門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委託在中國最受尊敬的顛地比爾洋行（Dent, Beale & C.^a）的代表作為葡萄牙在上海的領事代表，任命這間有聲望的商業公司的比爾先生作為領事為土生葡人提供保護。1868至1872年間任職澳門總督的基瑪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aães）在寄給海事海外部部長及國務秘書的公函內提到：“葡萄牙駐華領事沒有收取費用，沒有任何報酬，卻做了大量工作，常常要處理中國不同港口城市涉及葡萄牙人的棘手問題，因為所有涉及外國人的刑事或民事案件都是在領事館處理，而不是像歐洲和美國那樣在國家的法院裡解決。”（引自日諒教授，第152頁）

11. 同上，第173頁。

12. 同上，第302頁。

伴隨着移民潮，無論是在臨近的英國殖民地，還是在上海這個國際城市，很多土生葡人因其個人的特質成為社會重要人物。以下幾位便是其中的代表：

Policarpo António da Costa (1837-1883)，這位在澳門歷史書上不被熟知的土生葡人，因在香港取得職業上的成就以及以其自由、批判及勤奮的精神為捍衛十九世紀先進科學寫下的文章而成為突出的人物。他曾任職於粵港澳汽船公司，為維拉維索薩聖母無原罪教團騎士 (1883)，斯德哥爾摩地理及人類學協會會員。¹³ 香港葡裔俱樂部的精英，土生族群的代表人物，因其在香港社會取得的成就，被委任負責製作賈梅士三百週年紀念活動會刊《慶典日誌》，此活動正是香港葡人社團自我肯定的重要時刻。

Policarpo da Costa對於給予漫長生命進程嶄新的理解並對天主創世的理解提出挑戰的達爾文學說有深刻的理解。他留下了《為達爾文主義的辯護》一書及其他著作。正如標題所示，此書表達了對該十九世紀科學浪潮的支持。

徐薩斯 (Carlos Montalto de Jesus) (1863-1927)，引用學者 António Aresta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偉大的、未受到公平對待的澳門歷史學家”¹⁴，他是《歷史上的澳門》(1902)的作者，該書是有關澳門歷史的最著名的著作之一。

在以《Macau Histórico (歷史上的澳門)》為標題的葡語版的序言裡，歷史學家 Carlos Estominho 評價此書為“徐薩斯的榮耀及殉難”。¹⁵ 榮耀，是因為他作為歷史學家及土生葡人得到認可，得到評論界及澳門當局的尊重，被認為是關於葡萄牙定居在中國南部這段歷史最好的著作。¹⁶ 為了保證國際上更大範圍的推廣，以及香港、上海

13. 參見 Jorge Forjaz：《土生家族》，第1卷，A-F，澳門，東方基金會 / 澳門文化局 / 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第850頁。

14. António Aresta：《艾薩·德·克羅茲與澳門華人移民》。

15. Carlos Augusto Gonçalves Estorninho：“作為序言”，見於 C. A. 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東方文萃出版社，1990年，第7頁。第一版於1902年由必發出版社 (Kelly & Walsh) 以英文版出版。

16. 參見上述著作，第7、8頁。

及其他該區港口城市眾多葡裔族群可以了解其內容而以英文版出版的該書成為最暢銷書籍，並且很快售罄。殉難，是因為1926年在澳門出版的第二版，也是英文版，包括一些批評“近視的殖民制度”以及對“葡國悲慘狀況”的暗示的章節，作者提議“將澳門交給剛成立的國際聯盟接管以保持盛譽”¹⁷由於被認為嚴重侵犯了葡國的威望而遭到排斥。澳門當局下令扣押並放火銷毀在澳門市面上的有關書籍。1926年5月28日的革命之後形成新的政治局面，造成其他形勢影響了當時的澳門，而並未如他所期望的共和制度，為此，對葡國及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他感到非常失望。

生活在香港和上海的徐薩斯還著有《上海的崛起》（1906）、《歷史上的上海》（1909）等其他著作。博學的他在1896年11月9日成為里斯本地理協會會員¹⁸，也是共和黨的一名激進分子。

Rogério Hyndman Lobo，也被稱為羅保爵士（1923-2015），企業家、政治家及慈善家，是香港土生葡人社群當代最傑出的代表之一。曾擔任香港行政局議員（1967-1985）、立法局議員（1972-1985）、市政局議員、香港明愛主席、廉政公署諮詢委員會主席，及其他機構名譽顧問。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於1985年授予其“下級勳位爵士”勳銜¹⁹，其紋章的樣式為：“銀色底，三匹黑色行進步態狼垂直分佈在中部寬條內，其舌其爪紅色，鑲嵌於兩條垂直的藍色波浪紋內，兩邊

17. 參見上述著作，第334頁。

18. 在會員推薦中，包括以下人士：Lourenço Pereira Marques，土生葡人，醫生和慈善家，在香港從醫16年，退休後（在澳門義務為土生族群工作），寫下《達爾文主義的有效性》及其他著作，該書1882年在香港出版；Luciano Cordeiro，作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政治家，里斯本地理協會創辦人之一，1884/1885年柏林大會葡萄牙代表之一；Alfredo Jorge Vieira Ribeiro，香港商人，1895年會員編號2508——參見《1875年11月10日創會以來的會員名單，有關協會歷史的一些檔案》，里斯本地理協會出版，1900年，第10頁。

19. 其與香港幾間重要公司都有關係：P. J. Lobo & C.^a, Ltd, Associated Liquor Distriutors (HK) Ltd., Hong Kong Macao Hidrofoil Co., Ltd, Johnson & Jognson (HK) Ltd, Martell Far East Trading Ltd, Seagram Far East, Somec Group of Companies, Kjeldsen & Co. (HK) Ltd., Perrin Cooper & Co. Ltd., Pictet (Asia) Ltd. - Jorge Forjaz：《土生家族》，第1卷，A-F，澳門，東方基金會 / 澳門文化局 / 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

各分佈兩朵本色紫荊花；飾章上帶盔飾及銀黑兩色花邊，兩匹黑色只有上半身的半身狼，其舌其爪紅色，中間托舉着一朵本色紫荊花。黑色布邊紋一邊緣兩側呈銀色。”²⁰

Artur José dos Santos Carneiro (1905-1963)，朋友與崇拜者眼中“藝術”的代表，香港一位富商的兒子，他的一生都和音樂緊密相連。他是出色的小提琴家，是上海市交響樂團的成員。之後投入爵士樂世界，演奏其他樂器，如次中音薩克斯風、單簧管、手風琴。曾在新加坡、倫敦、蒙特卡羅、香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澳門生活和工作。戰爭結束時返回上海，但是不穩定的局勢迫使他重新輾轉亞洲：香港、新加坡、印度科欽以及印度。1947年與家人一起返回葡萄牙，在埃斯特里爾賭場和亞速爾群島拉格斯空軍基地的美國俱樂部表演。²¹

他是一名優秀的樂手，也是Roberto Carneiro的父親，Joana Carneiro的祖父。Roberto Carneiro為葡萄牙天主教大學的教授，教育部部長，葡語民族與文化研究中心主席，1998至2004年任澳門葡語學校基金會主席。而Joana Carneiro繼承了祖父對音樂的熱愛，成為一位指揮家。

江道蓮 (Deolinda da Conceição) (1914-1957)，作家、記者，短篇小說集《長衫》的作者，這本書選取了中國女人的生存狀況為主題，而作者本人也是滬港澳三地共同培育出的優秀代表。她在澳門出生，之後在上海和香港生活，日本佔據香港後返回澳門，並在《澳門新聞報》任記者。很巧的是，在報紙上她撰寫的專欄裡，關於土生葡人的特質及其流散，她這樣寫道：“在這個文明的世紀裡還有人不知道土生葡人的特性麼。作為那些早年來此定居的葡萄牙人的後裔，土生葡人的血液中肯定還混合了其他民族的血液（……），但是，他們並沒有枯竭，環境使他們變得強大。在文化領域，土生葡人展示了驚人的同化能力。除了母語，幾乎每個人都懂得另外兩種語言。所有土

20. 紋章證書 (1987.1.9)，參見Jorge Forjaz：《土生家族》，第1卷，A-F，澳門，東方基金會 / 澳門文化局 / 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第357頁。

21. Jorge Forjaz：《土生家族》，第1卷，A-F，東方基金會 / 澳門文化局 / 東方葡萄牙學會，澳門，1996年。第671至672頁。

生葡人都會講中文和英文，很多人還輕易地掌握法文。在澳門之外，他們遍佈遼闊的遠東地區，土生葡人形成自己的社群，通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在他們求生的土地上得到尊重。”²²

最後要介紹的是一位在澳門出生，而他的家庭是源自上海的黎祖智（Jorge Rangel），澳門國際研究所創辦人，並擔任該機構主席，各地澳門之家積極的聯絡人，通過不同活動保留及維護其成員的身份認同。關於他們的家鄉，黎祖智這樣說到：“我的祖父António Maria Óscar Rangel（.....）在上海出生，他的父親為Ildefonso Rangel，法學家，澳門出生，在上海扎根。我父親也是在上海出生，他的母親為Marianne Caroline von Hartwig Hagedorn，她是德國籍的男爵夫人。（.....）上海淪陷後，我祖父作為難民來到澳門，同他一起的還有很多葡裔，他們在澳門受到熱情的接待，在那個貧窮及混亂的年代，澳門對於遠東地區的葡裔就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在離開上海的時候幾乎把所有的財產都留在了那裡。”²³

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巨大的政治變動：清朝滅亡，共和國成立，軍閥的混戰，日本入侵，國共戰爭，1949年新中國誕生，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與他國外交關係的確立，以及“一國兩制”的實施，促成1997年與1999年香港澳門的回歸。

澳門見證了這些變動，有時作為警惕的旁觀者，有時遭受衝擊，如1966年“一二三事件”，有時也作為事件的主角，如在1987年和1999年過渡時期。

無論是“一二三事件”，還是過渡時期對未來的不確定，都促成很多土生家庭的離開，他們連同家人與朋友選擇移民到世界其他地方：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英國、巴西及葡萄牙。因此四大洲都遍佈澳門之家與澳門文化中心。

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信守其國際承諾，現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作為一個和平的、受歡迎的並有著美好未來的地區，流散的土生葡人如今可以回來和家人朋友團聚，重溫舊時的風俗、節慶還有記憶。

22. 江道蓮：“澳門與土生葡人”，載於《澳門新聞報》，1950年。

23. 根據2013年9月在澳門對黎祖智進行的採訪。